台湾地区文学透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世界华文文学中心编写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编 委 会

主　编　汤学智　杨匡汉　张德祥

编　委　汤学智　杨匡汉　张德祥
许　明　周政保　洪子诚
孟　悦　楼肇明　贺兴安
畅广元　李　星　肖云儒
傅美琳　田和平　王志章
邓晓丽　孙　玲　符　均
鲁小红　张　艳

总　序

当90年代第一个春天抖去80年代最后一个严冬的寒意阔步走来的时候，我们筹划推出这套《新世纪文丛》，向更添新雨洒人间的季节献上我们的真诚、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爱。

刚刚过去的80年代，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各个领域都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这是充满开拓和创造精神的年代，也是积极改革、辛勤建设、深刻变动的年代。改革开放的伟大业绩，将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上，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这种解放和发展，首先表现在纠正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问题上的理论偏颇，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与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现实主义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深化、丰富和发展。由此，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新天地。其次，由于“对外开放”，世界各地有价

值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观念、思维方法，大量被引进、试用、改造、重构，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开拓和创新，整个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态势。综观新时期文学，既造就了一批富有使命感、热爱祖国、勇于探索创新的优秀作家，又产生出许多思想深刻、内涵丰厚、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的确成就巨大。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一时期文学的进步和变化，带有“文革”及其以前的那些岁月不可比拟的性质，是那个时代所无法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它喻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世纪”。

“新世纪”文学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它在哪些重要领域重要方面，又在何种程度上取得了革命性进展？这种进展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动因如何？它的历史过程怎样？有哪些经验（正面和反面的）可以总结？其价值和意义何在？怎样促使这种“革命性”的新因素沿着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积极健康地向前发展，从而更好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的建设？这是每一位真正关心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公民迫切关心的课题，也是我们这套丛书所关注的重点。这套小书，有多数意在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探讨和回答上述问题。就作者而言，他们都努力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力图从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实中，着重探寻和发掘那些真正具有艺术生命力而又符合我国现实和未来发展的东西，哪怕它还很不成熟，还有缺陷，还很嫩弱。他们以此学术行为，立足于建设，着眼于淘金。诚然，各书作者之间在一些具体的学

术见解上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作者的某些观点编者也不尽赞同。这里，我们的原则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努力体现“双百”方针，尊重学术个性，尊重学术自由，文责自负，鼓励积极的建设性的学术争鸣。我们希望这些成熟的或不成熟的，正确的或带有偏颇的见解，能够从不同层面不同方向上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为了有助于更好地从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观点观察问题，我们特就台湾地区当代文学增设一本《台湾地区文学透视》，相信会得到读者的赞同。

自然，新时期文学发展中也并非一片光明的“新世纪”，如同整个社会现实在取得巨大历史性进步的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甚至某些方面的腐败、倒退一样，也出现了思想、理论、创作以及作风上的某些混乱乃至倒退。这种现象本身也是对文学的亵渎和玷污。人们完全可以从梳理问题的角度，对当今文学中的消极现象进行批判性的总结，从中找出应有的教训，以警示未来。这方面的工作已有人在做。

最后，借此机会我们衷心祝愿，在90年代里，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能够获得比80年代更为充足的阳光、雨露和滋养，让“新世纪”文学之花生长得更加旺盛，开放得更加火红、鲜艳，以更为昂然之生机，迎接2000年的到来！

1990年春于北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再版弁言

七年前，《新世纪文丛》得以出版，相继获中国图书奖、金钥匙奖、西南西北地区优秀图书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奖、文学所十年科研成果荣誉奖等五项重要奖项，对作者来说确属意料之外。我们只是出于对历史负责、对新时期文学事业负责的态度，以平常之心，以尽可能公允之心，做了一项勉为其难却又不可推卸的工作。如今能得到社会和读者的一些承认，这是我们深感欣慰的。

自80年代以来，我国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以"追新"、"弃旧"和"求异"三向并发的姿态与气势，从思维方式到艺术方式发生了种种与时代共脉搏的变化。举凡关注现实的人们，都会感受改革开放的风气对文学的抚爱和沾溉，都会体悟文学苦旅的艰难以及它所带来的经验与不足，也都会深切地确认，如今的文学世界已不再是群趋偏峰或单一中心的年代。迎向新世纪的文学，处于越来越广阔的空间里，既在历时的意义上与历史对话，又在共时的意义上与他人交流。对话和交流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那种制造否定历史话语或者把一己之见视为历史神圣而动辄对别人指手画脚的现象，终将受到历史的嘲弄。新时期文学发展和走

向繁荣的最深刻根源，在中国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之中。从历史和现实的深层所产生的时代精神是厚重、沉甸的。理论批评和学术研究也只有在对话和交流中，在把握历史脉动和现实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其足以走在前沿地带的可能性。

编辑与出版《新世纪文丛》，实际上还是寻找在文学发展中培育理论生长点和更新学术观念的过程。当今社会，需要多一些真正的观念型的文化人和批评家。他们应有对种种现实问题的超越性思考，有对流行价值观念的批评立场，有对责任、理想和使命的文化自觉。社会在走向多元化，批评与研究自然也该是多元的，让多种清音齐鸣。我们深知，在这世纪之交，任何个人、任何学派都不可能完全占据真理的全部空间。因之，宽容精神的彰显、人格情怀的到位和学术个性的坚持，理应并进于批评与研究过程中，合理的见解将受到尊重，自以为是的傲慢与偏见应当休息；任何识见的精当和正确与否，最终要由历史来甄陶，由时间来确证。这也是我们进行编撰的基本理念和心态，恳望得到读者的理解。

这套《新世纪文丛》七年后再版，因时间的推移和认知的加深，其修订乃至增删当属必然。我们力求保持整体的原貌，充实必要的内容，并使思考和表述更缜密、更准确一些。自然，原丛书中个别质量欠佳的书册，为了保持丛书的整体水准，不再予以重版，既是无奈却又必需。

新世纪的钟声已在不远的前方隐隐敲响。每个时代都有理由根据当代人的眼光来阐释文学走过的旅程。但愿这

套丛书的再版，多少能为新时期文学被人们接受、认同与确信，提供某些必要的见证。路还长，虽每每念兹而临深履薄，朝乾夕惕，然而一切不放弃以崇高品格对待所钟情的文学的人们，总会一步一个脚印地继续前行。文学的未来是属于新世纪的。

1998 年立春　北京

目录

001／ 第一章 飞鸟犹知恋故林
——台湾当代文学中
的中国文学母题

025／ 第二章 台湾地区文体风貌

070／ 第三章 在世界主义的陡坡上
——台湾现代小说的
表现艺术

087／ 第四章 凡人时代的救赎之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台湾新文化小说

120／ 第五章 文明的红灯示警

——台湾“环保文学”的发生与发展

135／ 第六章 星约·情冢·诗课

——张晓风散文论

167／ 第七章 鹿港·性·社会工作者

——李昂的小说世界

189／ 第八章 不敢为梦终成梦

——席慕蓉的艺术魅力

206／ 第九章 撩开心灵的帷幕

——欧阳子的小说创作

222／ 第十章 根脉相连血相通

——海峡两岸的“寻根文学”比较

247／ 后记

第一章

飞鸟犹知恋故林

——台湾当代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母题

在对台湾地区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人们对其所呈现的“中国情结”予以了必要的关注。但同时，一般人着意的，往往停留在“血浓于水”之类的情感与文词上，而忽略对其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型及其在台湾的本土新质的探讨。这种“原型”与“新质”的关联，在文学层面上，若以知识命题论之，即是文学母题及其变奏，很值得我们作一番思索。

1825年1月18日，歌德在同爱克曼谈话时指出：“母

题多么重要，这一点是人们所不理解的，是德国妇女们所梦想不到的。她们说‘这首诗很美’时，指的只是情感、文词和诗的格律。没有人梦想到一篇诗的真正的力量和作用全在情境，全在母题，而人们却不考虑这一点。成千上万的诗篇就是根据这种看法制造出来的，其中毫无母题，只靠情感和铿锵的诗句反映出一种存在。”①歌德从诗的角度谈“母题”，又把它和“情境”列作同义，未必是准确而完整的理论表述；但他强调“母题”的重要性，对追求文学作品更富有深刻的历史精神内涵，对我们在文化原型所提供的广袤南亩里穷达从容、纵横拾穗，无疑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提示。

考察文学现象，常常会发现许多作品潜在的母题及其不同的呈示方式。因而有的批评家认为：“蕴藏最深的思想——超过了某种作品乃至许多作品的思想，必须在原型象征物中去寻觅，作家也不得不转向这些象征。”②这不是意味着作家以初民身份从事传统资料的演义，而是从一定文化背景下的原型象征物中获得体验的凝聚和题旨的提炼，使一些基本母题得以赓续和新的诠释。“母题”原系音乐术语，迻至文学，狭义的是指原始主题，广义的，则可谓传统文化母体中基因似的经常重现的主题、形象、故事和情境的复合体。“母题”往往是超个人的，它反映着一民族世世代代普

---

①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1823—1832年)，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② 勒斯利、费德莱尔：《当代文艺研究成果》，转引自〔美〕魏伯·司各特编著《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138页。

遍性人生经验和心理经验的存积，是历史和文化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自然，它的情思内涵将由于优秀作家个性感受的加入而呈现增殖。“母题”往往生存于既定的、文化层的语境中，其题义联想，体现着传统的力量，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所熟悉，遂使作品不是囿于“自我情结”，而是让母体文化的声音在人们心中共鸣。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史实。中国人在自己的台湾地区承传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学，是顺乎自然、天经地义的。“愁云极目昼成阴，飞鸟犹知恋故林”①，是近代台湾杰出的爱国将领兼诗人丘逢甲怆怀家国的血泪诗句。“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②，是现代台湾著名作家钟理和的“原乡情结”和人生格言。当代作家如出生于台湾的学者兼诗人杜国清也说：“作为一个台湾诗人，只要在创作上使用的是中文，他就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挑战。而他的创作成就，终将归入这个传统，不管是被统入，或注入新的品质，而使传统原有的次序重新调整。”③中国文学作为台湾地区文学的“母体”，有其传统与精义，有其魂魄与血脉，有其与民族共存荣的历史，作为生长在台湾省的中国当代作家，谁想“跳出”或“割除”共同的文化——文学长河，都是徒劳的。

浸淫于中国文化——文学的传统大河，根据台湾地区

---

① 丘逢甲(1864—1912)：《愁云》，参见《岭运海日楼诗抄》。

② 钟理和(1915—1960)：《原乡人》，《钟理和全集》，第2卷。

③ 杜国清：《笠·台湾·中国·世界》，台北《笠》诗刊，第151期。

特殊的人文情境而进行创作，成了不少台湾当代作家的文心和追寻。函绵邈于尺素，中国文学的一些原型在这里敷演铺叙，群体性的“种族记忆”在这里腾挪流转，衍化为种种“母题”。若作大体的归纳，台湾当代文学中所呈现的中国文学母题，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悲情母题：“诗可以怨”的历史延伸

梁启超当年写台湾，砚沾悲情，称这里是“千古伤心地”①。侯效贤执导的在国际上获大奖的台湾影片，取名《悲情城市》，也以沧桑变迁反映台湾地区人民共通的哀怨。悲情之雾弥漫于文山韵林，到了当代作家笔端，亦自迥出尘埃，有悲情母题的提炼。小说家陈映真的早期名篇之一《乡村的教师》，着实是借小说艺术隐秘地表述一种苦难、悲情以及对理想的向往与破灭，让人物分担民族的忧郁。小说中，个人的苦难以社会的、历史的和时代的苦难为呈现方式。佃农出身的主人公吴锦翔，青春年少时富于改造、建设家乡的热情和理想。不久被日军强征去异域当兵，经受了一场“战争、爆破、死尸和强暴”的洗礼，并为了存活而在婆罗洲参加过“人肉”筵席。 烽火五载如梦一般过去，吴锦翔重返故里，接办一所乡间学校，年青时改革乡土的热望重新

① 见梁启超《台湾杂诗》之一：“千古伤心地，畏人成薄游。山河老旧影，花鸟入深愁。人境今何世？吾生淹此留；无家更安住？随意弄扁舟。”

燃烧起来。然而光复后，依然是岛内磨难，国内动荡，民族分离，无情的现实剥夺了他实践理想的可能，心中的蓝图不过是画饼充饥式的“精神享受”而已。尤使他陷于怆绝的是，当他在酒醉时透露了曾“吃人”的秘事，村人都远远离开了他，终于良心幻灭、理想崩溃而切脉自尽，那“无血液的白蜡一般的脸上，都显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深深怀疑的颜色”。对于这篇作品，有论者视为写了社会现实迫使改革论者言行背反，或是因跋涉现代派而望不见旭日东升。①这种从“主义”出发的论评权当一家之言。我倒愿意请读者注意潜藏于作品的“人肉筵席”的意象。吴锦翔死里逃生，但在战争中吃过人的罪恶感，需要他以相当的勇气去承受内心良知与现实碰撞所产生的巨大痛苦的折磨，而环境又是“吃人”的社会，他的归宿必然是既吃过人又被人吃的悲剧结局。

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意味深长的悲情母题。《乡村的教师》很自然使人联想到鲁迅《狂人日记》的母题：没有年代的历史，每页都写满“仁义道德”，字缝里则是“吃人”二字。鲁迅极尖利地解剖了精神分裂的心态：“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②这“眼光”和《乡村的教师》中死者最后的“脸色”，都在“深疑”上吻合，看来绝非偶然。悲情在于切切实实的人生竟成为的的确确

---

① 参见辽宁版《现代台湾文学史》(1987)、《台湾小说发展史》(1989)。

②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小说集》，21页，1952，北京。

的灾难。既“吃人”又“被人吃”，便是这种悲情的物化形态。这类母题，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断重现。即以《红楼梦》（这委实是一部多种母题杂陈的繁富的大书）中的王熙凤为例，判她是“反面人物”有失公道，此人要说也是悲剧。她是封建家族管理的代表，两面三刀，贪婪心狠，杀伐决断，俨然是“吃人”的角色；但她对上，又是个佞臣，丑角，被贾母寻开心的“猴子”，到头来只剩下跪诉流泪的份儿，还是“被人吃”了，终于也汇入“渺渺茫茫、归彼大荒”的人生悲剧的大命题中。白居易《轻肥》诗云：“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那不仅是具体的真实，也是普遍性的真实；不仅是天灾所致，也是由人祸酿成——在人吃人的社会和年代，民生惟有困厄悲愁、无所告语的无限怨恨。白居易因深疑而怒火中烧：“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①悲情转化为悲愤。再往上追溯，屈原明知会招来“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离骚》）的惨局，却仍然坚执于“知死不可让”（《怀沙》）的品行，“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是十分突出的悲情性格。文学史上，变《风》变《雅》之哀怨，建安七子之悲凉，鲍照、庾信《拟行路难》《哀江南》的愠怆，杜甫“三吏”“三别”之沉郁，陆游、辛弃疾对收复河山之悲怀，乃至黄遵宪《台湾行》之诗怨，莫不以“悲情”二字投入人生和文学。由此看出，悲情主题和悲情形象，就如同基因般地可以在中华民族文学的总母体中找到踪迹。

---

① 白居易：《杜陵叟》。

悲情母题在台湾当代文学[①]中不断繁衍，其发展路向大致分为两种形态。

其一是炼狱式悲情。台湾地区曾两度沦为荷兰殖民者(1624—1662)和日本帝国主义(1895—1945)直接控制的殖民地，在台湾人民灵台上留下耻辱与苦难的深深印痕；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归祖国，但随着国民党当局迁台，实行“反共”、内控的高压政策，使岛内民众加深了再度与大陆分离的精神苦难。这双重的悲怆境遇，既造成了特殊的社会情态与普遍心态，也使那些具有历史感和使命感的当代作家，在其笔端凝聚更为强烈的忧国之痛和感时之哀。这种悲情是富有历史性的，作家投入人生的悲情，也就势必会让笔下的主题和形象带上“炼狱”的特质。被称作“大河小说”的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和李乔的《寒夜三部曲》，即以反殖民、反封建、反迫害为题旨，以粗犷的写实笔法展开人物的苦难命运，艺术地概括用血泪与炼狱写成的孤愤和抗争的历史。《台湾人三部曲》由《沉沦》《沧溟行》《插天山之歌》组成，以自甲午战争(1894)到抗战胜利(1945)半个世纪为历史背景，以陆氏家族从流寓台岛筚路蓝缕到前赴后继抗日救国为主线，让几代人经受坎坷人生的折磨和良知灵魂的拷打。诚如作家所述：“他们是一群冒险犯难的贫者——在大海尚被赋予不可知的神性的时日里，他们越过汹涌的波涛

① 需要补充一个概念上的说明：按照约定俗成，“当代文学”在大陆均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台湾地区当代文学”，依我治学所见，宜从抗战胜利回归祖国算起，因它标志着台湾“日据时期文学”的终结和新的文学阶段的开始，有其当代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